

一本越讀越厚的書——

邁克爾·沃爾澤《正義與非正義戰爭》譯後

◎ 任輝獻

多年以前，一位老師似乎是不經意地談起了自己多年的讀書心得。讀一本好書要經過一個從薄到厚，又從厚到薄的過程。第一遍讀會覺得這本書很薄，用三言兩語就可以把整本書的內容概括出來。繼續讀下去就會發現許多有趣的問題，每個問題背後可能都隱藏著一個深不可測的神秘世界，都可以做一篇大文章。如果有足夠的耐心，生命中的各種機緣也使你有機會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把這些問題一一弄清楚的話，最終有一天會忽然發現這本書又變得很薄，每個問題都變得清澈透明，但此時你的境界與最初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當時聽的時候沒有太在意，只是覺得意思有點像古人所說的「初看山是山、再看山不是山、最後看山還是山」的那個意思。去年受朋友之托勉力為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當代政治譯叢」翻譯了美國當代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的《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¹，才品出老師話中的些許滋味。不過迄今為止我只是感覺這本書越讀越厚，還沒有達到把這本書「變薄」的境界。

在動手翻譯之前我先走馬觀花地通讀了一遍。老實說，感覺非常平淡。是的，我從這本書中知道了「戰爭非常恐怖，非常殘酷，戰爭造成的破壞十分驚人，然而有時候戰鬥卻是正確的」這個作者認為「很難接受的真理」；知道了戰爭是極端情況下的一種特殊人類活動，不是毫無規則的胡打亂鬥而應當遵循規則；某些戰爭和戰爭中的某些行為是非正義的，應該予以譴責。除此之外，這本書似乎也無甚高論。有一段時間我甚至對它是否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否值得花費大量時間翻譯產生了懷疑。不過想到之前曾經為此事專門徵求過我的導師、南京大學哲學系顧肅教授的意見，他非常肯定地說這是一本政治哲學名著，在西方學術界被譽為「新經典」。以顧老師對西方政治哲學的了解應該不會走眼。另外，幾年前在《讀書》上曾看到梁治平的一篇文章，他在介紹自己訪問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的生活時十分崇敬地提到過這本書的作者沃爾澤，稱其為「坐著愛因斯坦辦公室的人」。這樣的著作應該不會是浪得虛名的平庸之作吧。打起精神繼續翻下去，逐漸進入作者的語境之後，才逐漸感到了這本書的厚重。

首先，要得出「有時候戰鬥是正確的」（這裏的正確顯然是指道德正當）這樣的結論，或者堅持「存在正義的戰爭」這樣的命題並不像想像中那麼簡單。對西方政治哲學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社會在對待暴力和戰爭的態度這個問題上，除了正義戰爭論之外，還有兩種悠久的傳統，即和平主義和現實主義。和平主義認為暴力和戰爭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在道德上不可能證明任何暴力行為的正當性。和平主義拒斥所有的暴力行為，它在西方社會最強大的淵源是基督教的誠命。耶穌教誨說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臉，就把左臉給他打。儘管對基督的誠命應該如何解釋還存在分歧，和平主義在西方社會卻一直是一個不絕如縷的傳統。學術界

對和平主義的學理論證也越來越細密、精緻，生產出了大量的文獻。一些基督教教派堅持篤信非暴力，西方國家的反戰運動中不僅有反對非正義戰爭的正義戰爭論者，絕對反對一切暴力的和平主義發揮的作用也不容低估。

和平主義雖然否認存在正義的戰爭，畢竟還是以道德的話語在談論戰爭。而現實主義傳統則從根本上否認對戰爭進行道德判斷的可能性。根據現實主義的觀點，每個國家從本性上必然都要追逐自我的利益、權力和安全，國家之間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和爭奪權力、利益必然發生戰爭（這就像狼一定要吃羊一樣必然）；而戰爭一旦開始，暴力就遵循自身的規律衝破一切道德和法律的限制。借用沃納·濟戈爾（Werner Jaeger）的話就是：「武力的原則形成了自己的領域，有它自己的法則」。所以，戰爭和戰爭中的行為事實上不受道德約束也不應該受道德約束。一句話，現實主義根本否認道德話語在戰爭和國際事務中的意義。

現實主義在西方一直有許多鼓吹者。尤其是近代以來，肇始於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的現實主義更是成為主導國際關係的主流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均勢理論。現實主義的得勢有兩個知識方面的原因：一是繼自然科學獲得巨大成功之後，社會和人文學科也提倡價值中立的經驗實證研究。政治、法律等「社會科學」紛紛將價值問題作為非科學的內容逐出自己的門庭。戰爭正義論屬於典型的道德話語，當然也未能倖免，它在美國大學一度被逐出了國際關係和政治系甚至哲學系的課堂，只能在神學院尋得一塊棲身之地。二是達爾文主義在社會領域一度甚囂塵上。即使是在二戰後建立了聯合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仍是主流之一，其中許多代表人物中國讀者都耳熟能詳：漢斯·摩根索、喬治·肯南、亨利·基辛格，以及所謂的「新現實主義者」肯尼斯·瓦爾茲和羅伯特·基歐漢等。

順便說一句，這種知識潮流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很大，因而現實主義很容易引起普通中國讀者的認同。現實主義用我們從近代以來開始熟悉和流行的話語就是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很多國人信奉「勝者王侯敗者寇」，相信在國際關係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硬道理，在戰爭中「打得贏」才是硬道理，實力決定一切，「弱國無外交」；不相信在國與國之間有甚麼真正的道義，道德話語充其量也就是裝裝樣子，打打口水仗。許多人仍將那句不知道是那位西方人說過的「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奉為至理名言。道德這個本來十分崇高的辭彙在我們的日常話語中也是灰頭土臉。只需想像一下，如果有人被稱為道德家他會作何反應。

言歸正傳，要回答「是否存在正義戰爭」的問題，就必須首先下大功夫解決從道德視角討論和研究戰爭問題的正當性的問題。也就是說，首先要反駁現實主義的論證。《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副標題是「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可以說是與現實主義的主張針鋒相對。沃爾澤在第一版序言中旗幟鮮明地宣稱自己「要為政治和道德理論收復研究正義戰爭理論的領地」，換言之，就是要恢復規範研究和道德話語在戰爭問題上的正當性。如果他的這個努力能夠成功，對於恢復規範研究和道德話語在其他社會問題的正當性也將具有普遍意義：「如果這個結論說得通，它必定對所有政治選擇面臨的問題具有普遍意義。因為戰爭是最艱難的場合：如果在戰爭中可能存在可以理解的、確定可靠的道德判斷，在別の場合也就有可能。」顯然，沃爾澤的努力與當時正在復興中的政治哲學強調規範研究的方向是一致的。請注意：標誌政治哲學復興的羅爾斯的《正義論》初版於1971年，《正義與非正義戰爭》初版是在1977年。

沃爾澤是這樣反駁現實主義的：所謂的「現實主義」其實是無視或者沒有正確理解最基本的現實。因為，「與人類所受的其他苦難不同，戰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捲入戰爭的人們不僅

是受害者，也是參加者。」戰爭始終是「一種有目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有人應為其結果負責的人類活動。」所以，人們事實上總是在對戰爭和戰爭中的行為進行道德判斷，要求特定的道德行動者為特定戰爭和戰爭中的錯誤行為負責。為了強調道德世界的現實性，沃爾澤認為「我們的爭論和判斷經過長時間的重複之後形成了一種現實，也即道德語言所描述的、或者必須在其中使用描述性道德語言的全部經驗」構成了一種現實，他稱之為「道德現實」。我們無可逃避地生活在一個道德的世界裏。道德並非是一幅掩蓋和扭曲現實的有色眼鏡，可以隨時摘下來以便能看清真實的世界。我們不可能不從道德的視角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行為。和自然的現實一樣，道德現實同樣具有現實的強制力量。一個人頭撞在牆上會感到疼痛，違反了道德法則同樣會感到痛苦。恐怕很難有誰會否認良心的內疚和折磨的存在。當然，也不排除有某些感覺不到內心痛苦的道德遲鈍者——比如自稱在決定向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時從未失眠的哈里·杜魯門總統——不過他們必定無法避免感覺到另一種痛苦：他人的譴責和懲罰。姑且不說那些身敗名裂的戰犯，即使是貴為戰勝國美國的總統，杜魯門戰後在準備接受牛津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時，也因受到英國民眾的強烈反對而作罷。對於一個想要留名青史的政治家來說，被指責應對殺戮數以萬計平民的決定負責，這種痛苦肯定是刻骨銘心的。這就是道德現實的力量。

人們總是在對戰爭進行道德判斷，這符合經驗常識。但現實主義的鼓吹者通常並沒有無視人們常常將正義之類的道德觀念適用於戰爭問題的事實，他們會說：這只是一種幼稚的誤用，把道德判斷用在了不該用的領域。因為與個人在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中一樣，國家在無政府的國際事務中是受「自然必然性」或「天性必然性」驅使和支配的，在這裏不存在自由選擇，所以也不存在是否正義的問題。人們譴責不正義的戰爭，譴責戰爭中不正義的行為，就如同譴責火山爆發、海嘯、地震或者狼蟲虎豹傷害人類一樣是沒有意義的。歷史學家們和國際政治專家們論證了許多戰爭並非個人謀劃或人類選擇的結果，似乎真的和自然災害一樣違背所有參加者的意願不可避免地「爆發」。當然，也有人在進行決策，但他們都是在按照戰爭的必然邏輯決策。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的邏輯是這樣發展的：「敵對的各方互相迫使對方行動。」結果是一種「互為因果的行為」，一種持續不斷的升級。在這一過程中雙方都是被迫採取行動，即使首先進攻的一方也不是犯罪，因為每個行動都會自稱為，並且幾乎的確是為了自衛而先發制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這場導致1500萬人死亡，讓「整整一代歐洲青年躺在地下」的戰爭似乎真是按照克勞塞維茨的邏輯發展的。對於任何人都無法避免和控制的現象，我們應該譴責誰呢？也許只能抱怨命運和上帝。

為了理解現實主義的觀點，我們應該讀一下現實主義作家的著作，比如基辛格的《大外交》。曾擔任過美國助理國防部部長和哈佛大學政府學院院長的小約瑟夫·奈在其名著《理解國際衝突：理論與歷史》中同樣非常精彩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複雜原因和過程。他引述了一戰前擔任德國首相的伯納德·馮·皮洛夫公爵在回憶錄中記述的在戰爭爆發後不久與時任德國首相的貝斯曼·霍爾維格會面的情景：貝斯曼就站在房屋的中央，我永遠忘不了他此時的臉色和眼神。某個著名的英國畫家畫過一幅畫，畫中一隻可憐的替罪羔羊的眼睛裏流露出不可言狀的痛苦神情，我現在就在貝斯曼的眼中看到了這種痛苦的神情。開始我們誰都沒有說話。最後我對他說道：「告訴我，事情怎麼會這樣？」他舉起自己那細長的胳膊，用遲鈍的、疲憊的聲調回答我：「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在此後很多關於戰爭罪行的辯論中，我常常想，假如能夠把當時貝斯曼站在那裏說那些話時的神情抓拍下來，那該多好啊！這樣一張照片一定是這位可憐的人從未想要戰爭的最好證明。

這雖然僅僅是一種個人印象，卻從一定程度表明身居決策地位的霍爾維格和捲入戰爭的許多

普通人一樣對局勢發展的身不由己和無奈。另一位在戰後被要求承擔戰爭責任者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同樣如此。他在戰爭爆發之前曾致電與自己有表親關係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希望他避免與德國交戰。正如小約瑟夫·奈所說，我們不可能把戰爭的爆發歸結為一個單一的原因。戰爭的爆發是各種因素長期積聚的結果，克勞塞維茨將其形象地比喻為「放電」。將戰爭爆發的責任簡單歸結為某個人或者某些人道德的邪惡或者過錯是十分簡單幼稚的想法。

個人在戰爭中的行為同樣是身不由己。戰爭一旦爆發就難以控制地依照自己的規律發展。艾森豪維爾將軍曾說過：「當你訴諸武力時，（（你不知道會走到哪里（（如果你越陷越深，那就沒有甚麼限制（（除了暴力自身的限制之外。」克勞塞維茨說：「戰爭趨向於把暴力使用到極致，」也就是說越來越殘酷無情，因為「如果他的敵人不這樣做，毫不顧惜任何人員傷亡的無情的暴力使用者必定取得優勢」並取得勝利。所以，受休昔底德和霍布斯所謂的「自然必然性」所迫，一旦有可能敵人就會更加殘酷無情。軍人職業就是殺人和被殺，在你死我活、命懸一線的戰場上他們根本不能也不會顧忌甚麼規則和道德。正如一句西方諺語所說：「在戰爭中法律緘默無聲」(Inter arma silent leges)。

應該承認，現實主義的論證還是相當有力的。要反駁現實主義的論證就必須證明人類在戰爭和國際事務中仍然是可以選擇的，用哲學術語說就是，仍然是自由的。這又使我們回到了那個聚訟紛紜的「意志自由」之謎。康得已經注意到人的道德實踐活動必須以自由作為前提，但他認為自由只能「懸設」而不能證明。「如果理性不自量力要去解釋自由何以可能，或者換句話說，去解釋純粹理性怎能成為實踐理性，那麼它就要整個地逾越了自己的界限。」沃爾澤同樣預設了在現實中具體的人本來就是道德的、自由的；現實主義認為人是受「恐懼、自私、本能驅使、嗜血殘忍」支配，這是一種抽象的、非現實的人性預設。沃爾澤說：「預設鄰居的惡意不是真正的審慎；這只是犬儒主義，是從未有人循之生活或能夠循之生活的一種世故。」我們事實上就生活在道德的世界中，在戰爭和國際事務中也仍舊如此。「我們確實在一個道德世界中行動；作出某些決定確實很困難、讓人拿不准、折磨人，這與道德世界的結構有關；語言反映了道德世界並使我們進入道德世界；最後，我們對道德辭彙有十分普遍和穩定一致的理解，因而共同的判斷是可能的。」

沃爾澤承認戰爭中的人們的確受到極端的強迫，但在任何現實而非抽象的戰爭中，人類都並非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都是面臨各種不同的可能選擇。即使是國家的行為也是由具體的人決定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可能政策中作出的選擇。對於人類行為而言，所謂的必然性並不存在，或者說只是一種有意無意的語言混淆或誤用。在希臘語和英語中「必然」

(necessity) 這個詞都有「道德上必須的 (indispensable) 和不可避免的 (inevitable)」兩種含義。對於人類行為者而言，只有前一種含義才是適用的。即使面臨著死亡的威脅，也很難想像有甚麼行為是「不可避免的」。康得曾舉例說，一個好色之徒在面臨死刑的威脅時必然會放棄淫欲的機會而不可能有別的選擇；但如果以死刑相威脅要他作偽證，那麼他完全不能否認他除了貪生怕死之外還有其他一種選擇，即捨生取義。「所以他斷定，他能夠做某事是因為他意識到他應當做某事，他在自身中認識到了平時沒有道德法則就會始終不為他所知道的自由。」我們評判一個人的行為通常不是依據自然的因果法則，而是依據道德和法律規則。在沃爾澤看來主張自然必然性的真實意義仍然是一種申辯：試圖借此解脫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可避免的 (inevitable) 這種意義上的必然性判斷永遠是回溯性的，這樣的判斷應該由歷史學家而不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作出。歷史中的行動者永遠面臨著不同的選擇，所以永遠不能逃避自己的道德責任。比如，犯罪學家可以在事後總結出某個罪犯之所以犯罪的種種「原因」，包括社會的、生理的、偶然的等等，似乎他的罪行是「不可

避免地」爆發。但這絲毫不能解脫他的罪責，因為我們總是預設了他自由選擇的可能性，除非他是缺乏健全心智的精神病患者或者兒童。

現實主義反對道德話語的另一個殺手鐮是認為它「沒有清晰的指稱，沒有確切的定義，不受邏輯的限制。」也就是說，只表達說話者的情感，沒有客觀的指稱物件，因而根本不存在真假對錯。霍布斯說：「一個人所謂的懼怕、另一個人會稱之為明智，一個人所謂的公正、另一個人會稱之為殘忍，一個人所謂的大方，另一個人會稱之為糜費……等等。所以這類名詞從來就不能用為任何推理的真實基礎。「人們在道德爭論中常常人言人殊、各執一詞，永遠沒有確定的答案，這好像是印證了現實主義關於道德話語沒有意義的主張。沃爾澤承認人們在一場戰爭或一個行為是否正義的問題上常常發生分歧，但他認為現實主義並沒能理解這種經驗到的現實或者對其作出正確的解釋。和戰略術語一樣，道德術語不僅是規範性的，也是描述性的。儘管道德術語的意義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文化中會有所變化，但並非沒有確定的意義，否則人們根本就無法相互理解，也不可能發生爭論。比如，米洛斯人主張雅典人對他們的進攻「不正義」，即便時隔千年，語言的變化已經滄海桑田，當今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人還是都能夠理解他們的主張。通過開放的爭論和辯駁，道德主張終究可以分出是非真假。比如，誰能否認「納粹殺害猶太人是濫殺無辜」是一個真命題呢？

現實主義認為在戰爭時期的道德話語中常常充斥著偽善。戰爭的每一方都會自稱正義，會使用謊言和道德辭藻掩蓋自己追求權力和利益的真實意圖，但這僅僅是「正義的偽裝」——即便納粹德國政府也有強大的「宣傳部」。沃爾澤反駁說，偽善恰恰證明了道德世界的現實性，證明了道德的效力。「我們的價值觀在時光流逝中保持穩定的最明顯證據就是軍人和政治家們所說的謊言中不變的特點。他們說謊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這樣就為我們描繪出了正義的輪廓。我們在那裡發現偽善，就會在那裡發現道德知識。」偽善表明在戰爭中是否被視為正義特別重要，即使並非真心誠意相信道德的人也不得不偽裝自己。每一個偽善者知道自己的行為不得不接受其他不偽善者的道德判斷，而他們的判斷將影響他們對偽善者的態度和政策。偽善者希望得到其他人的道德理解、同情和支持，因為這對於能否獲得戰爭的勝利十分重要。不能因為存在偽善否認道德爭論的意義。既然偽善者在不得不承認公認的準則，揭露偽善就成為社會批評的重要方式。

在反駁了現實主義之後，沃爾澤便放開手腳展開他的「道德論證」。他把道德世界比作一個巨大的建築，並謙虛地自比導遊，希望帶著讀者「在這座建築中漫遊一周」。這座建築十分複雜，非常容易迷失其間。有了沃爾澤的指引我們就可以一步步踏入這個殿堂：為甚麼發動戰爭是錯誤的？在甚麼條件下先發制人的攻擊不是侵略而是正當的？為甚麼基於宗教和意識形態理由使用武力攻擊別的政治共同體是錯誤的？為了促使別國「進步」——比如說幫助該國建立民主制度——而使用武力也是錯誤的嗎？甚麼條件下對別國的軍事干涉才是正當的？為甚麼無論其所打的戰爭是否正義，雙方軍人在戰場上都有殺死對方的權利？殺人也可以是一種「權利」嗎？軍人有權利殺死那些人？「敵人」的意義是甚麼？為甚麼在戰爭中穿上軍裝就（暫時）喪失了，投降後就恢復了生命權利？區分平民、軍人的標準是甚麼？甚麼條件下允許造成平民傷亡？故意攻擊政治上支持本國政府戰爭努力的敵國平民為甚麼是非正義的？在總體戰條件下區分軍人和平民還有意義嗎？為甚麼有些被捕的游擊隊員沒有戰俘的權利？為甚麼有些被捕的革命者沒有戰俘的權利？他們在甚麼情況下會獲得戰爭權利？為甚麼公民有義務為國家而死？政府投降後國民還有權利反抗侵略者嗎？根據甚麼說某個政府是合法的政府而另一個卻是「傀儡政府」？為了獲得正義戰爭的勝利能否使用非正義的手段？怎樣才算獲得了戰爭的勝利？以甚麼條件結束戰爭才符合正義的要求？在甚麼情況下可以為了

勝利而「越過」戰爭規則？政治家對戰爭負有甚麼責任？甚麼層次的政府官員應該承擔責任？普通官員應當承擔甚麼道德責任？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的公民對於本國政府發動的非正義戰爭的道德責任有甚麼不同？知識精英負有甚麼責任？……我相信大多數中國讀者和我一樣，不僅不知道怎樣回答這些問題，甚至從來就不曾或很少清晰地向自己提出過這些問題。這裏面沒有富國強兵之術，我們的學者教授根本就不屑於浪費自己的高級腦力勞動來研究這些顯得鑽牛角尖的幼稚問題。沃爾澤，這個生活在一個產生了實用主義哲學的國度裏的猶太人卻非常認真地梳理了這些問題。隨著沃爾澤這個導遊巡遊一周之後，讀者可能會發現自己對戰爭以及許多其他問題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至少我得承認自己對許多一直困惑不解的問題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不僅如此，通過對戰爭的透視，還可以對許多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的理論問題——比如道義論（權利論）和功利論的內在差異，手段和目的，道德與偽善，以及人民、民族、國家、政府的關係、服從與反抗等——有更深入的瞭解。

沃爾澤在英美大學受過系統的西學人文教育和扎實的學術訓練，對西方的歷史、哲學、政治和文學經典爛熟於心。他編織論證的方式也頗具大師風範，似乎是在與古今的賢哲對話，從休昔底德、普魯塔克、培根、格勞休斯、馬基雅維里、霍布斯、洛克、休謨、盧梭、伯克、克勞塞維茨、密爾這些古典作家一直到西季威克、薩特、羅爾斯、諾奇克、格林、奧維爾、內格爾、喬姆斯基、雷蒙·阿隆，他都能信手拈來、運用自如。從這本書讀者可以約略窺見西方學術尤其是政治哲學深厚傳統的門徑，如果能循其脈絡逐漸深入也許就有可能登堂入室。也難怪美國政治哲學家丹尼爾·貝爾使用這本書作為他給清華大學研究生開設的政治哲學討論課的教材——要真正領略其中的妙處，恐怕只有親自閱讀原著一個途徑。

這本書還另有其厚重之處。沃爾澤的論證很少使用許多歐陸哲學家喜歡的晦澀術語，也很少使用英美道德哲學家喜歡的假想案例，而是通過對歷史事實——從古代希臘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一直到當代的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戰爭——的分析展開自己的觀點，然而這絲毫無損於他思維所達到的深度。相反，這種方式使得這本書更加引人入勝，更有親切感和現實感。與我們之前熟悉的宏觀歷史不同，沃爾澤通常是聚焦於歷史的局部細節，凸顯出歷史中的行動者作出選擇和決定的過程。比如，我們心目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正義的同盟國戰勝邪惡的軸心國的歷史，卻很少有誰聽說過沙漠之狐隆美爾堅守軍人職業道德、撕毀希特勒下達的殺死所有戰線後方遇到的敵人的命令的義舉；我們知道德國在二戰中佔領了瑞典和挪威，卻不知道其實是時任英國海軍大臣的邱吉爾費盡心機破壞挪威中立地位的行為把瑞典和挪威拖入戰爭的。所以，這本書也是一本社會批判的著作。

事實上，沃爾澤不僅是一個書齋裏的學者，他還長期擔任著在美國享有盛譽的「異議」雜誌主編。他將社會批判作為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報效國家和社會的義務，其道德批判的鋒芒始終是對準自己所在的西方社會，而不是以自己所在的陣營左右自己的對於具體問題的立場。作為一個居於主流社會的知識精英，他越是愛自己的國家，他的批判就越不留情面、越尖銳、越深刻。他譴責邱吉爾領導的英國為了打擊德國的戰爭士氣對德國城市進行的主要針對平民的「戰略轟炸」以及美國對日本本土的類似轟炸，論證了美國對廣島和長崎使用原子彈的非正義性，稱之為「現代主義的地獄火海」。尤其是他令人信服地剖析了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不可能獲勝，也不應該獲勝。」美國不可能獲勝是因為他們唯一可以使用的戰術必然導致一場針對平民的戰爭，而消滅所有的越南平民是不可能做到的；不應獲勝是因為，如果平民對越共游擊隊支持的程度排除了美國其他戰術選擇，那麼游擊隊事實上就是這個國家合法的統治者，美國主張自己是反對北越干涉南越的反干涉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說美國對越

南的軍事干涉是非正義的。換言之，美國在這場戰爭中不可能獲勝從根本上講是由於道德的原因。這就令人信服地從道德的層面解釋了許多人長期以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為何美國擁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實力和先進的武器裝備卻在衣衫襤褸的越南游擊隊面前鎩羽而歸？沃爾澤的分析不僅是對美國政府錯誤政策的批評，也是對所有迷信技術和實力、漠視道義者的一個警醒。

有位法律家說：戰爭並非全然是暴力統治一切的世界，戰爭狀態也是一種法律狀態。其實，戰爭又何嘗不是一個道德的世界呢？沃爾澤在戰爭這個地獄中開闢出了一個道德的新天地。在當今西方，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已經得到改觀。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也通過一批像沃爾澤這樣的學者的不懈努力，正義戰爭論不僅收復了在西方大學裏的失地，重返哲學系、政治系的課堂，甚至美國的軍事院校也紛紛規定將戰爭倫理作為重要的課程。我們從電視螢幕上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軍隊將領在電視攝像頭前面都不得使用正義戰爭論的話語和邏輯講話。即使不說正義戰爭論已經取代了現實主義成為西方的主流話語模式，至少可以說兩者已經比肩而立。也許我們可以將《正義與非正義戰爭》作為這個轉變的一個起點和標誌。

2006年歲末於武昌小東門

註釋

- 1 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 Company, 1977). 《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即將出版。

任輝獻 先後畢業於武漢大學哲學系和法學院，獲哲學學士和法學碩士學位。現為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西方政治哲學和法哲學。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期 2007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期（2007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